

法眼

看名著

从《红楼梦》看古代“姓名权”

《人民法院报》张景卫

在中国古代等级森严、尊卑有序的宗法社会下,人的言行举止无不受到严格的规范,姓名自然也难逃窠臼。相比今天,古人姓名不仅是个人代号,还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,隐藏着丰富的法律规则。而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,有名有姓的达数百个,书中人物的姓名,也蕴含了许多古代姓名法则。

姓的法律功能

姓名,姓对应家族,名则对应个人。宗法制度下,姓的作用远大于名,甚至许多人如妇女、下人只有姓,没有名。按照成文法,姓有两大功能:

其一是“别婚姻”。“同姓不婚”于西周入礼,于唐代入律。至《红楼梦》成书时的清代,《大清律例》“同姓为婚”条规定:“凡同姓为婚者,(主婚与男女)各杖六十,离异(妇女归宗,财礼入官)。”

其二是“分贵贱”。统治阶级特别是皇帝为凸显其高贵,通过政治改革或律令,将一国之姓区分若干等级。如确立门阀序列的北魏孝文帝,将天下姓氏分成三六九等,强调“以贵承贵,以贱袭贱”,为后世帝王所沿用。

姓还受民间习惯法规制。民间习惯法认为,即使同姓,但若不同“同谱”“同宗”,仍有贵贱之分。所以,古人常通过“认祖归宗”“通谱”“连宗”等方法,提高家姓地位,甚至达到攀权附贵的目的。《红楼梦》第2回,贾雨村对冷子兴说,自己和贾家“自东汉贾复以来,支派繁盛,各省皆有……若论荣国一支,却是同谱”,并最终攀扯上了贾府,“夤缘”复旧职,其后又步步高升。第6回也写道刘姥姥的女婿王狗儿家族与王夫人娘家“连过宗”,并借此到贾府“打秋风”(即利用各种关系向人索取财物)。

避讳

避讳,是古代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在姓名上的表现。《春秋公羊传》记载,取名、书写甚至交谈应“为尊者讳,为亲者讳,为贤者讳”。讳,包括公讳与家讳,最先作为礼而存在。公讳一般是避免使用皇帝、孔子的名字,家讳则指避免使用家族尊长名字。《唐律疏义》将避讳之礼法定,通过“上书奏事犯讳”条(公讳)和“府号官称犯父祖名”条(家讳)依法护礼。其中“府号官称犯父祖名”条规定:“诸府号、官称犯父祖名,而冒荣居之……徒一年。”即官员所任官名与任职地名不得与父、祖之名相同,否则即为犯罪。宋对唐萧规曹随。但是,该制度造成皇权与父权冲突,为当权者所不愿,故被明清法律所弃。

尽管律无正条,礼仪之邦的国人仍将避家讳奉作圭臬。《红楼梦》多处体现了避讳这一封建规矩。第2回,黛玉(母亲叫贾敏)写敏字时会“减一二笔”,并将敏字读成“密”字;第54回的说书人当王熙凤面说出《凤求鸾》中的“王熙凤”后赶紧赔罪;第62回,宝玉和姐妹们玩“射覆”游戏,宝钗“覆”了一个“宝”字,宝玉通过“宝”想到通灵玉的“玉”,于是就联想到同时含有“玉”和“钗”字的古诗“敲断

玉钗红烛冷”,并笑道:“姐姐拿我作雅谑,我却射着了。说出来姐姐别恼,就是姐姐的讳,‘钗’字就是了。”这些都是家讳。

与“府号官称犯父祖名”条不同,“上书奏事犯讳”条则延续至清代,《大清律例》规定:“凡上书若奏事,误犯御名及庙讳者,杖八十。余文书误犯者,笞四十。若为名字触犯者,杖一百。其所犯御名及庙讳,声音相似,字样各别,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,皆不坐罪。”可见,封建法律对触犯公讳者惩罚非常严厉。在曹雪芹生活的雍乾年间,因触犯避讳禁令的文字狱案件不胜枚举。其实,《红楼梦》也涉及公讳,它的许多早期抄本中,都通过刻意减笔书写“玄”“允”“弘”等字,以避康、雍、乾帝之讳。

起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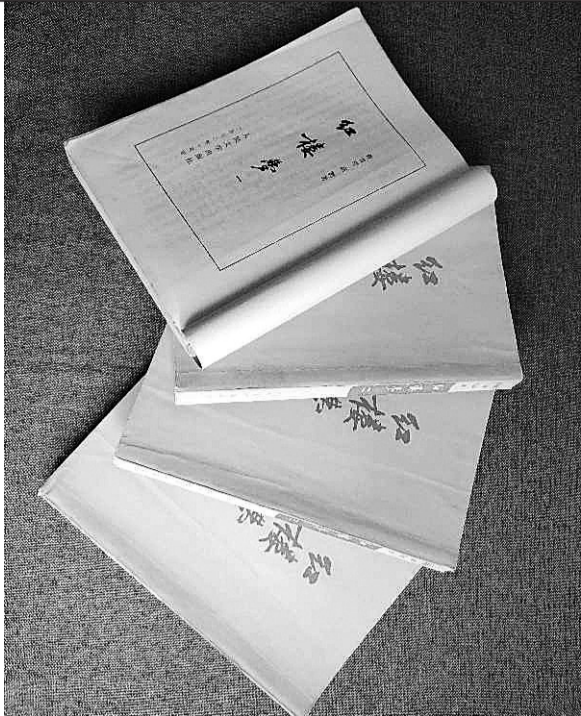
周代起,起名就要遵从“五则”“六避”规则,“五则”指名字五个方面的来源,即“信”“义”“相”“假”“类”;“六避”则要求取名时避国名、避山川名、避官名、避疾患名,避祭品(畜生)名、避祭器名。

秦汉以后,门阀制度使社会注重门第观念和家族出身,由此催生了祧字(行辈字派),祧字多由祖先事先按照辈分拟定,归入族谱,以家礼或家法的形式固定下来,形成规“范”,凡家族后人世入丁均要“范”字取名,不尊族规者不准叙入家族世系。“范”字取名规则,在家族绵延过程中,使同一支脉族人通过“论字排辈”清楚推算出世系、辈分,成了区分尊卑的最好方式。

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家作为诗礼簪缨之族,子孙的取名就是严格按照行辈字派规则来的:宁荣二公贾演和贾源,“水”字辈,且均是三点“水”;二世贾代化、贾代善、贾代儒等是“代”字辈,且“代”字居中;三世贾赦、贾敬、贾政、贾敏等是“文”字辈,且“文”字居右;四世贾珍、贾珠、贾璉、贾环等是“玉”字辈,且“玉”旁在左,贾宝玉属这一辈,理应从“范”,但却取了双字,不过仍有“玉”字,这是一个特例,为了照应“石头记”并突出其主角地位;第五代贾蓉、贾兰(蘭)、贾芸等是“草”字辈,且“草”在头上。“范”字取名,可以同辈男女“范”一字,如贾敏与贾政等,也可以女性单独“范”一字,如元春、迎春、探春、惜春,未“范”同辈的“玉”字,而“范”“春”字,同样符合“范”字取名规则。

改名

封建社会中的改名,除了自己改以外,多是尊贵者如皇帝、家长给卑贱者如臣民、子孙、奴仆改名。皇帝可通过赐姓、赐名以示褒奖,如明成祖赐名下西洋而闻名的马三



保为郑和。如果被皇帝赐予国姓,对受赐者而言是最高荣誉,如刘邦除封赏项伯为列侯外,还赐姓刘等。当然,皇帝还可将臣民的姓贬为恶姓,以示惩罚,如武则天称帝后,将曾反对其专权的李姓诸王孙贬姓为虺。

在贵族家庭里,家长像皇帝一样,对子孙、奴仆享有姓名决定权、改名权。《红楼梦》中被改名者主要是奴仆,这充分反映了他们低下的法律地位。第2回,袭人本名珍珠,又姓花,因有诗“花气袭人知昼暖”,宝玉将其更名为袭人。第21回,宝玉问蕙香的名字是谁起的,蕙香回答:“我原叫芸香的,是花大姐姐改了蕙香。”因宝玉正在气头上,遂说“正经该叫‘晦气’罢了,什么蕙香呢!”于是因其在家排行第四将其改名为“四儿”。第63回,宝玉给芳官改名“雄奴”“耶律雄奴”,导致芳官常被人叫“野驴子”。其后,宝玉又将芳官改名“温都里纳”等。除了宝玉,书中的主子们几乎都给人改过名:林黛玉将贾母所赐丫鬟鹦哥改名紫鹃;英莲被卖入薛家后,被宝钗改名香菱,后作为薛蟠侧室,又被正室夏金桂改名为秋菱;湘云将葵官改叫“韦大英”等。

按照现代民法,姓名权的内容至少包含姓名决定权、使用权、改名权三个方面。但在古代作为下人,奴仆显然没有姓名决定权和改名权,而对姓名的使用,也难称得上“权”。所以,封建社会的姓名权只是权贵者的专有权。除了被改名,很多奴仆的名字本身也不具有姓名权保护的意

义,如赖大、赖二、二姐、三姐、四儿、五儿、狗儿、旺儿等。对于优伶这类人,更是如此。为元春省亲采买的十二个小戏子,只有带“官”字的艺名,如文官、龄官等,以卖艺为生,本人也被卖来卖去,没有人身自由,更遑论姓名权。而艺名,是这些优伶社会地位的枷锁,也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。

由此可见,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,通过姓名去标记每个族群和个体的身份贵贱,通过祧字宣教尊卑有别、长幼有序、主奴有分。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,姓名就是地位的象征,只有皇帝享有绝对的姓名权,家长、尊者的姓名权则靠家法、家礼提供相对性维护,而贱民的姓名只是代号,谈不上“姓名权”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)

谈古

论今

县令问他:妻子手上疤痕在左手还是右手?

从古代一虚假案件说起

《人民法院报》朱会良

清人赵吉士在其笔记《寄园寄所寄》中记载,明朝万历年间,王临亨任浙江海盐县县令,他审理案子从不隔夜,从不拖拉,百姓赞他为“王一时”。当事人打官司的费用绝对不会超过一升米价,所以百姓又称他为“王一升”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王临亨不仅会断案,更会“办案”,善于通过观察来判定案件真伪,明辨案件是否构成虚假诉讼,从而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

王临亨审理过这么一件案子。一女子待字闺中,一男子前来求婚,女子的父亲不答应。男子便诬告说,他早已与这女子成婚,而她父亲想将她另嫁他人。男子还有婚

书、媒人、聘金等等证据。审案时,王临亨将那女子叫到跟前问了几句话后,突然转过来问那男子:“你妻子手上有疤痕,你记得是在左手,还是在右手?”男子愕然,茫然不知。假案遂被揭穿。

虚假诉讼,是指案件当事人为了达到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,通过虚构法律关系、捏造事实、伪造证据、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手段,严重影响民事诉讼的行为。虚假诉讼一般表现为:当事双方系亲属、同事、朋友或者具有共同利益关系;原告诉请司法保护的标的额与其自身经济状况严重不符,被告存在经济状况恶化、意图转移有效资产等特殊情

况;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,双方无实质性民事权益争议等。由此可以看出,虚假诉讼既

有当事人利用现有证据捏造事实,也有当事人恶意串通,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利益,还有当事人与案外人恶意串通损害另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近年来,虚假诉讼量大类杂,导致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准确识别时存在一定难度。同时,虚假诉讼往往与刑事犯罪紧密相连,刑民交叉案件时有出现。因此,虚假诉讼不仅干扰案件正常审理、浪费司法资源,导致矛盾扩大、诉讼周期延长、当事人诉累增加,还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,影响社会稳定。诚信诉讼是当事人参与诉讼的基本要求,也是确保司法公平公正的应有之义。如何防范不诚信诉讼行为的发生,成为法院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。